

试析中国朝鲜族女性的涉外婚姻

全 信 子

(延边大学 民族研究院, 吉林 延吉 133002)

[摘要]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 中韩交流日益频繁, 朝鲜族女性的涉外婚姻急剧增长。但由于中国朝鲜族女性婚姻观发生了衍变, 同时两国间存在着“同源异流”的文化类型, 使朝鲜族女性的涉外婚姻经历了盛行和抵牾的过程, 给社会带来了不同的效果。

[关键词] 朝鲜族女性; 涉外婚姻; “同源异流”文化

[中图分类号] C91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11(2004)04-0039-05

随着全球的一体化, 人们在现代生活中不断追求新的物质文明已成为一种时尚。在这种势不可挡的社会潮流中, 不甘落后的朝鲜族女性已经打破传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在市场经济中充分发挥着自己的才能, 发家致富, 成为民族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不可否认, 也有一些朝鲜族女性为了改变自己穷困落后的经济地位, 将目光由国内转向国外, 通过改变婚姻的途径来改善自己的处境。由于韩国是后起的中等发达国家, 加之中国朝鲜族与之同源、同语言, 所以大多数朝鲜族女性在涉外婚姻中自然地选择了韩国。然而, 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朝鲜族女性, 由于对“同源异流”文化的熟知和抵牾, 加上各自不同的婚姻动机, 使涉外婚姻的文化内涵多样化, 其婚姻状况并非都很幸福, 众多朝鲜族女性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冲突中彷徨、犹豫, 没有信心把握自己的未来。为此, 本文就此作一粗略考察。

1 市场经济与朝鲜族女性涉外婚姻的盛行

市场经济的伟大作用就是极大地调动了个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因而大大提高了财富的增值速度; 同时由于它利用了人们原始的利己心, 即人对物质享受永不满足的“贪欲”。因此, 它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增加了个人可能得到的自由度, 打破了自古以来多数人已经习惯而且视为当然的生活方式。

在探索和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为了引进外资和国外的先进技术, 中国进一步扩大了开放的力度。这种开放加快了中韩之间的相互交流, 我国朝鲜族对韩国的飞速发展非常羡慕。1992 年 8 月 24

日, 中国与韩国正式建交, 这给中韩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机遇, 使朝鲜族进一步认识了“汉江奇迹”, 因而萌发了到韩国发财的念头。朝鲜族到韩国不仅因为语言相通、饮食习惯相同, 而且是因为作为“同民族”可以得到多方关照。因此, 朝鲜族从包裹小商贩的卖药生意开始, 逐渐发展到赴韩国打工、劳务输出、留学等。不仅如此, 在朝鲜族聚居区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有很多韩国人投资办厂, 经商做买卖, 再加上每年到长白山的韩国游客数量相当可观, 从而极大地刺激了延边旅游业的发展, 带动了延边经济的发展。这种交流促使了朝鲜族女性十分向往韩国丰厚的物质生活, 而最稳妥的出国途径就是缔结婚姻, 与韩国男性结婚。仅以延边为例, 朝鲜族女性的涉外婚姻人数从 1994 年的 829 名, 发展到 1997 年的 3 066 名, 而到了 2000 年, 却又下降为 1 954 名。^[1]从涉外婚姻增长的趋势看, 嫁到韩国的朝鲜族到 1997 年达到了顶点, 而后回落。这就不难看出, 韩国在遭受经济危机时, 朝鲜族女性的涉外婚姻也走入了低谷。

由于朝鲜族女性的涉外婚姻带有很多不同的背景和功利因素, 其婚姻模式也难免呈现多样化, 它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

1.1 爱情婚姻——相互了解, 心心相印缔结良缘

在互相交流、交往过程中, 彼此加深了解, 心心相印缔结百年之好, 这是知识层次较高、经济能力较强的朝鲜族女性涉外婚姻的特点。她们通过留学、做生意、从事外资企业及出入国际舞台施展自己才华的过程中, 遇到了知己, 缔结了婚姻。一位在韩国读博士课程的朝鲜族女性崔某, 在学习的过程中结识了一位韩国男同学。在交往过程中, 他们产生了

收稿日期: 2004-10-12

作者简介: 全信子(1957-), 女, 朝鲜族, 延边大学民族研究院副教授, 在读博士。

感情,缔结了姻缘。由于他们有才识,有能力,加上勤奋,两人的生活越过越甜蜜,越过越富裕。当周围的人问及此事时,她会自豪地说:幸福的生活是我们通过共同的智慧和勤奋营造的。还有一位申女士,向一位受欺骗而穷困潦倒的韩国青年伸出了友谊之手。她用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帮助了这位韩国青年。在患难中他们产生了感情,申女士不顾亲友们的反对毅然选择他为终身伴侣。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的共同努力终于结出了爱情的硕果。这些浪漫的爱情故事,说明朝鲜族女性不论在韩国还是在中国,都能成为丈夫事业上的好助手、家庭生活中的贤内助。

1.2 “交换婚姻”——韩国男性的经济实力与朝鲜族女性容貌的交换

朝鲜族女性涉外婚姻的一种模式是男性的经济实力与女性的容貌之间的交换。朝鲜族女性所具备的自身资源是容貌,她们通过自己的容貌资源,缔结婚姻以换取男方的经济实力。这种婚姻不是以爱情作为基础,而是以生存条件作为基础。因此,这些朝鲜族女性往往选择社会地位比自己高、经济实力比自己强的男性作为伴侣。因此,男女年龄差异普遍悬殊。选择这种交换婚姻的大都是来自农村或者是无职业的底层女性。她们没有能力面对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的挑战,要想改变目前贫穷的命运,最佳的途径就是选择有钱的韩国人。笔者在婚姻登记办调查过程中发现,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占着较大的比例。一位金女士说,我是一个农村姑娘,没文化,没技术,有的只是年轻和美貌,要想富裕只能嫁人,通过我的容貌换取经济实力。不仅如此,通过婚姻媒介还可带来“后关联效应”——劳力输出,即邀请女方父母到韩国逗留打工赚钱。

1.3 “契约婚姻”——为取得“绿卡”的手段

随着涉外婚姻的盛行,一些不法分子趁虚而入,组织非法地下婚姻介绍所。他们利用一些朝鲜族女性急于出国的心理,与韩国的不法分子相勾结,进行涉外婚姻的交易。他们把严肃的婚姻大事视作挣钱的途径,对涉外婚姻的对象不负责任。只要男女双方见过面,就交给有关部门办理手续。通过这种交易,中国方面的中介人从朝鲜族女性手里获取2 000元介绍费,韩国方面的中介人则向韩国男青年收取高达400万~500万韩元的辛苦费。婚姻成交后,中方中介人还要向韩国的当事者索取五六百美元的辛苦费。^[2]由于这种婚姻介绍所在暗地活动,所以有关政府部门就较难加以控制。此外,他们还利用

欺骗的伎俩隐瞒当事人。韩国全罗道姓宋的男青年想从中国找一个配偶,他先后两次来到延边,经延吉一个韩国独资企业的介绍,花800万韩元结了婚。后来才发现,女方竟是由该公司的已婚女职员粉墨登场,结婚证也是假的。^[3]

如上所述,朝鲜族涉外婚姻盛行之快,模式之多,一则为改革大潮所驱使,另则,更是为涉外婚姻的性质所决定,即“跨国民族婚”。

2 市场经济与朝鲜族女性婚姻观的衍变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处在了大变革、大转型的时期,它不仅意味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转换,而且还表现为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发生了重大变革。社会转型具体表现为: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性社会转化。社会转型也给朝鲜族女性的社会生活、婚姻生活和思想观念带来了重大影响。

2.1 婚姻目的的更新

朝鲜族的婚姻观向来深受儒教文化的影响,特别注重婚姻行为本身,把婚姻行为视为既是实现家族人伦延续新老嬗递的前提,又是人伦秩序的基础和进行广泛社会联系的手段。因此,过去大多数朝鲜族女性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解决婚姻大事,本人基本上没有权利支配自己的个人问题。

解放后,我国朝鲜族的婚姻观和婚姻形式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以男女双方的爱情为基础,以追求双方共同的幸福为目标,达到婚姻目的。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朝鲜族女性的婚姻观念从传统保守型走向现代开放型;婚姻的目的,也是从过去多子多福,生男为荣,走向晚育、少生、优生,重视夫妻恩爱生活。女性摆脱家庭的羁绊,不再一人包家务,天天绕锅台转,而是走向社会,夫妻双方在社会活动中各显其能。

2.2 婚姻择偶标准的变化

朝鲜族婚姻择偶,过去良贱不婚的门第观念很浓。男女双方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称心如意的对象,而要受对方家长的社会地位、门阀和权力的影响。不仅如此,族内婚戒律也比较严格,忌讳选择他民族为配偶。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潮流,朝鲜族人口大量流向城市,择偶标准变得比较宽泛,在族内婚的选择上发生了由集体本位向个体本位的偏移,在生活方式上,偏重物质利益,淡泊精神追求;而从90年代末开始,从经济实惠开始过渡到富有内涵的浪漫的情感。在婚姻择偶标准上,爱情理想化的色

彩越来越浓,但追求经济实惠的人仍占一定的比例。

2.3 离婚、再婚观念的变化

往昔,朝鲜族对离婚和再婚的法律限制十分严格。男女双方一旦成婚,即使没有感情基础或是感情破裂,也要“白头偕老”,而离婚者,则会遭到社会的歧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个性解放意识开始萌生。在现代人的婚姻观念中,双方感情破裂,就要以离婚来解除双方的痛苦。离婚虽说是婚姻的不幸,但又不幸生活的终结。用英国著名的法学家亨·梅思的观点来说,这实际上是人类婚配史上的一大进步,它使人有可能摆脱外部力量的约束而进行符合个人意愿的自由的选择。其结果,婚姻不再是一种束缚夫妻的桎梏。朝鲜族女性追求婚恋自由,注重婚姻的内在质量,婚姻生活不满意时,她们不像从前那样忍辱负重地维持家庭,而是提出解除婚约。

3 对“同源异流”文化的认同及其情结

我国朝鲜族作为跨国民族,是在国内 56 个民族中历史较短的少数民族之一。历史上,中国和朝鲜以图们江、鸭绿江为界,隔江相望,自古以来你来我往、互通有无,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交流非常频繁,形成了密切友好的关系。尤其当发生战争或天灾时,两国大批的黎民百姓过江逃往对方国家避难,并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汇融于对方国家之中。朝鲜族移居中国始于明末清初,而其过程一直延续到 1945 年日本投降为止,历经清朝、民国三百多年。

中国朝鲜族的文化渊源于朝鲜文化,也就是说,在朝鲜半岛形成共同的文化体系后,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许多朝鲜人移居中国。因此,无论从族源、语言、文字、生计方式、风俗习惯、价值伦理、艺术等,都较完整地保留了根基因素,传统色彩十分浓厚。共同的祖先、同一种语言、稻耕文化的饮食习惯、人们的儒教价值伦理都相同,可以说,中国朝鲜族文化是朝鲜半岛文化的“同源异流”。这个同源的分支文化又从中国汉文化土壤中吸收了新的养分,具有了与朝鲜文化不同的特色——中国朝鲜族文化,即朝鲜族文化所内涵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性和朝鲜族文化的个性。中国朝鲜族文化的这种特性,是他们从朝鲜半岛迁入我国东北后,在与包括当地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患难与共、共同开发和建设东北边疆的几百年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换言之,我国朝鲜族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逐步形成为只有中国朝鲜族独具的、区别于其他国家朝鲜民族的文化个性。

历史事实证明,一个民族的文化,不是静态的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迎合周围环境的变化,时时处在不断变化的动态之中。我国朝鲜族文化的个性,就体现了这种规律。在东亚儒学文化圈国家中,朝鲜半岛也曾经创造出引以为自豪的灿烂的民族文化。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国朝鲜族从朝鲜半岛迁居到我国东北,在开发和建设东北大地的过程中,与其他民族一道,患难与共,不断吸收中国多民族文化,增进中华民族的诸要素,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之无愧的一员。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共同的社会主义理想把朝鲜族同汉族及其他民族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从民族性格上看,朝鲜族吸收了汉族持久耐劳、贵在坚持的优点;在生活方面,学习汉族勤俭节约、精打细算、艰苦朴素的美德;在语言文字方面,朝鲜语引进了不少新出现的汉语词汇,在日常生活中也夹用许多汉语词汇。尽管朝鲜族具有上述中华民族的共同点,而且这些共同点还在增多,但是,他们仍保存着自己的显著特色。这些特点不仅表现在民族意识、语言文字等方面,还表现在经济、文化、教育、风俗等各个领域。也就是说,中国朝鲜族与韩国人在历史文化上有很多的因缘。他们在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住宅文化、礼仪文化、观念文化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联系。朝鲜族虽然移居中国数百年,但仍保持着很多的传统。一首“阿里郎”之歌就能把许多原本不相识的人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他们的认同意识。比如,对朝鲜民族的始祖——檀君神话的认同;另如,对风俗习惯的认同。饮食习惯以稻米为主,酱汤、泡菜仍为日常用餐;尊师重教,舍弃家产也要供子女读书,尊老爱幼的良好风尚;再如,对民俗音乐、民俗舞蹈的认同。朝鲜族民谣——“阿里郎”、“道拉吉”,音乐舞蹈相融合的“农乐舞”都是认同的典范。

朝鲜族之所以能对韩国文化产生熟知感、认同感,是因为朝鲜族在移居中国并结成新的民族共同体时,不仅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自身文化价值体系,而且在他们移居到中国这一新的生活空间以后,仍然完整地保留了自身所拥有的文化传统,其生活方式也没有发生太大的改观,而这又与当时朝鲜族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有直接关系。首先,移居地点——东北接壤于朝鲜,又是清朝的发祥地,所以这一地区无论是经济土壤还是文化土壤,都是相当贫瘠的,且作为中国文化之主体民族的汉民族的“闯关东”行为也是以相同的动机和在相同的时间进行的;加上东北辽阔的空间和富饶的自然资源,又最大限

度地减少了不同民族间的竞争;当时中韩两国的政治环境及络绎不绝的人员流动都从客观上为朝鲜族固有的传统文化得以保存创造了条件。其次,中国和韩国同属于一个东亚文化圈,中国文化对韩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两国文化的共同点,使朝鲜族迁入到中国后并无明显的异质感。再次,朝鲜族移居中国并不是出于文化上的影响,而是由经济因素所造成的,也就是由经济生活所迫。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也有大批志士为了反日救国来到东北,还有一部分人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强制移往东北,而不是出于对祖国和民族的背叛。因此,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思乡意识,并把它化作固守自己传统文化的动力。这些都使朝鲜族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有一种亲切感、熟知感,对韩国的文化必然有一种认同,这就给朝鲜族女性的涉外婚姻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文化基础。尤其是中韩正式建交后,韩国文化的不断传入,从而唤起了朝鲜族对同源同根文化的追忆和认同。

4 朝鲜族女性涉外婚姻的文化冲突

朝鲜族女性的涉外婚姻由于文化上的认同感与其他各种因缘,十分盛行,但她们嫁到韩国后,因为文化冲突和价值观的冲突,使她们的涉外婚姻经历着一场不寻常的波折和动荡,有的经不起冲突,导致婚姻生活的失败;有的在冲突中以妥协、忍耐的形式维持婚姻;还有的采取躲避甚至逃离现实的方式。

朝鲜族女性与韩国男性的涉外婚姻,虽是同一个民族的跨国婚姻,但他们并不属于同样的社会属性。众所周知,朝鲜族与韩国人虽然具有相同的自然属性、种族属性以及相同的语言与风俗习惯,但由于生活在不同的社会体制下,因而所形成的人格、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存在很多差异点。

在传统社会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韩国,妇女担当着家庭主妇的角色,女儿、妻子、母亲是女人生活的轨迹和全部角色。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妇女走出家门,走向了社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妇女开始了职业女性的生涯,她们得到了社会较多的照顾。因此,在朝鲜族女性当中,充当家庭主妇的比例是较少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广大朝鲜族女性一旦嫁到韩国,充当起家庭主妇的角色,就感到很不适应。而在韩国,女性充当家庭主妇的比例很高,不论才识高低,做全职太太则反以为常。

家庭主妇的角色具有如下特征:其一是从属于人,男主女从。其二是为人工具。妇女的作用表现为:操持家务,即家务工具;繁衍人口,即生育工具;

夫妻生活,即性工具。其三是拘囿于家庭。妇女“足不出屋”,活动的天地就在家庭内。其四是人格低下。“男尊女卑”、“夫为妻纲”规定了妇女的卑下地位。^[3]这种男本位文化下的家庭生活方式,培养了女性的顺从、依赖意识。而这样的家庭生活模式使从前活跃在社会领域的朝鲜族女性深感难以适应。她们不甘心把自己禁闭在家庭的小圈子里,更不愿听从男人的摆布,从而引发了不少家庭矛盾。一位嫁到韩国的朝鲜族女性李某曾吐露道,我嫁到韩国后,只在家里做饭、洗衣、清扫,同保姆没什么两样,外面的世界对我来说太陌生了,我嫁到韩国想过一种舒适的生活,更想接受和学习先进的科技文化,可如今的生活领域狭窄得让人寂寞孤独……在韩国家庭生活方式中,女性的单一角色和中国朝鲜族女性双重角色的冲突,使很多朝鲜族女性处于孤独、困惑的境地。

有些朝鲜族女性为了达到出国的目的,以契约的形式缔结婚姻,并利用种种手段和伎俩取得“绿卡”后,就不告而别,这在韩国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其结果,不少韩国人至今仍对中国朝鲜族女性怀有嫌疑、不信任的态度,这给她们的正常生活带来了很多困难。朝鲜族女性尽管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中,但仍免不了在家庭中处于孤立的地位。朝鲜族女性的涉外婚姻,因基本上是以移居韩国的方式缔结,所以存在着很多弊端。首先是朝鲜族女性期待经济能力的愿望幻灭。虽是同一民族,但由于朝鲜族不是韩国人,所以,必然受到很多限制。其次,在家庭中的地位低下,得不到丈夫及婆家的信任。再次,只有通过丈夫才能保障自己的合法身份。这些冲突,使朝鲜族女性面对现实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因无脸再回到中国,有的以妥协、忍让的方式维持艰难的婚姻生活;有的无法忍受这种不公平,解除婚姻离家出走;有的为了获得国籍暂时忍受,策划着加入韩国国籍后的计划。她们各自不同的心理,给涉外婚姻蒙上了不少阴影。

总之,朝鲜族女性的涉外婚姻,由于在文化上的认同感和熟知感,使她们的交往不存在语言障碍与陌生感,除了履行的手续繁杂外,进展速度很快。然而,由于中韩两国在不同体制下所具有的不同社会属性;韩国男性的自由出入、主动选择与朝鲜族女性的被动相亲 and 应诺的不同;朝鲜族“同源异流”文化的情结;由于文化变异带来的文化冲突及朝鲜族女性与韩国男性各自不同的心理和利益,从而出现了千差万别的婚姻模式,给朝鲜族女性的涉外婚姻带

来了不少不幸的后果。朝鲜族女性对韩国从文化认同走到文化适应,从文化变迁到文化冲突,具有兴奋、茫然、惆怅、沮丧等复杂心态。她们痛苦地扮演着同族“异邦”的角色,艰难地维持着婚姻生活。朝鲜族女性的涉外婚姻带来的并不都是金钱的、物质的美梦,而更多的是忍让、妥协和付出。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汉风”在韩国刮起,很多企业把目光对准中国的市场,在中国的韩国企业也不断增加,从而使涉外婚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不仅如此,随着涉外婚姻的内涵不断丰富和逐渐走上健

康轨道,真爱逐渐成为朝鲜族女性涉外婚姻的主旋律。

[参考文献]

- [1]许明哲主编.延边朝鲜族婚姻家庭现状及走向[A].当代延边朝鲜族社会发展对策分析[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210.
- [2]朴今福.关于涉外婚姻的思考[A].金永万,等.回顾与展望[M].沈阳:辽宁出版社,1996.
- [3]武汉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编.女性与社会[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105.

A Tentative Analysis of Foreign Marriages of Korean-Chinese Women

QUAN Xin-zi

(Institute of National Research,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Jilin, 133062, China)

Abstract: With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kept continual contacts with ROK in various fields. Along with it comes the great soar in the number of foreign marriages of Korean-Chinese women. However, Korean-Chinese women's concept of marriage has already changed and so has their culture, which has diverted from the same origin with that of ROK. As a result, these foreign marriages of Korean-Chinese women have undergone a process of surging and declining, the result of which has exerted different influences to our society.

Key words: Korean-Chinese women; foreign marriages; different cultures diverting from the same origin

会讯:中国人文社科学报学会“五代会”在广州召开

中国人文社科学报学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于2004年11月8日~10日在美丽的滨海城市广州召开。这次大会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承办,参加人数达200多名。中央宣传部出版局、教育部社政司、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教育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部门、单位的有关领导应邀到会并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会议的议题有四项:一是听取龙协涛先生所作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二是开展了题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与各刊各栏建设”的学术研讨;三是修改了《中国人文社科学报学会章程》;四是选举产生了以龙协涛先生为首的新一届学会工作班子。会议经选举确定新一届147家理事单位(延边大学社科学报为理事单位之一)。

会议一致认为,“四代会”以来,学会的队伍不断壮大,今天已发展为约800家单位会员的大社团。各会员单位形成了尊重老同志,充分依靠中年骨干,大胆提拔重用年轻同志的良好氛围。会议最后指出:今后学会的工作应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增强活动、壮大实力,扩大影响力,使高校社科学报向特色化、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全面提升高校社科学报的学术质量和办刊水平。

(丛 光)